

改革进入深水区 如何打好攻坚战

今天,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。未来30年,中国将往何处去?在又一个重要的历史关头,该如何打好改革这场攻坚战?什么力量能更积极稳健地推动改革?

为此,本报分别专访全国政协委员、中国(海南)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,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秘书长袁绪程,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,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宏观研究室主任党国英,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周超。

本报时事访谈员 曹保印 高明勇 北京报道

胡锦涛 话改革

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,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;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,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、发展社会主义、发展马克思主义;改革开放符合党心民心、顺应时代潮流,方向和道路是完全正确的,成效和功绩不容否定,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。

——2008年12月18日: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30周年紀念大会

温家宝 话改革

二十年前,小平同志不顾八十多岁的高龄来到广东,讲了许多语重心长、发人深省、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话。他明确告诉我们,要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,不改革开放只能是死路一条。这些话我以为至今仍有强大的震撼力,而且有着巨大的指导意义。

在经历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的今天,我们要继续下定决心、鼓足勇气,毫不动摇、永不停顿地把改革开放推向前进,特别是要有针对性地做好改革开放的长期规划设计,继续大胆地试、大胆地闯。解放思想、实事求是,是我们长期坚持的根本思想路线。这一点不会变也不能变。

——2012年2月4日:在广东重提邓小平南巡讲话

【关键词】
改革困境

改革难题是利益关系失衡

改革初期,“人人皆受益”的“帕累托改进”环境令人振奋,改革的阻力因此比较小。如今,当改革进入深水区,真正意义上的改革,已很难再出现“无损被改革者利益”的现象。要进一步推进改革,就必须调整现有利益格局。这也符合大多数人对当下改革困境的判断。那么,是什么导致了改革的困境,又该如何走出困境?

迟福林 利益关系失衡导致困境

【即便有些领域的改革方案确定了,却很难推行,久推不决,决而不做,做而不力。】

总体来说,改革的确陷入了困境,最突出的矛盾就是既得利益关系的失衡,这成了影响改革冲出困境的主要因素。应该说,既得利益格局——既包括既得利益集团、既得利益者,也包括某些既得利益现象——已经形成。

在这种格局下,形成了

三个比较突出的问题。第一,造成了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失衡,企业、政府在整个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日趋上升。第二,造成了投资与消费的关系失衡,这既与目前的增长方式有关,也与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失衡有关。第三,权力运行与权力约束失衡,部门利益、地区利益、行业利益都很突出。

因此,即便有些领域的改革方案确定了,但却很难推行,久推不决,决而不做,做而不力。

郑永年 决策者改革意志需强化

【改革困境不单在既得利益格局,而是既得利益者如何影响到改革决策。】

现在一谈到改革,大家都会提到既得利益格局,这是一个社会现实,不可回避。

但,我们要对此深入分析。没有一个国家、没有一个社会没有既得利益集团,既得利益集团是正常现象。问题在于,既然都有既得利益集团,为什么在有的

社会里改革仍能进行下去,而有些社会就很难推进呢?

30多年前,邓小平推动改革开放时,也不能说没有既得利益集团,为什么他能推动?别忘了,今天的改革环境比以前也好多了。

分析30多年前的改革取得成功的因素,会发现有三点重要启示,即成功的改革,需要三个因素:一,决策者的改革意志要很坚定;二,改革的目标要很明确;

三,动员改革的一切力量。即使是既得利益集团内部,也有很多改革的力量。

所以,仅仅考虑把既得利益集团“打倒”,改革还是很难走出困境的,旧的既得利益集团打倒了,新的既得利益集团又会站起来,那样还会陷入困境。改革的困境不单纯在于既得利益集团,而是既得利益集团是如何影响到改革决策的,要警惕出现利益一体化的倾向。

袁绪程 权力介入要素配置过多

【如果不改革现行体制,贫富悬殊、分配不公、社会冲突等问题,不仅很难合理有效解决,还可能演化为社会危机。】

改革开放30多年来,中国独有的增长模式及其相应的体制,将中国从一个落后贫穷的国家,带入到初步小康的中等收入国家。这种独有的增长模式,特指中国独有的尚未成型经济形态,不是作为稳定范式来理解,也不牵涉模式之争。

这种增长方式,导致了中国经济发展的非常态,原因很多,也很复杂,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就是权力与市场混合的集权体制,简单地说,就是政府权力较多地介入资源等生产要素的市场配置。

在中国经济社会转型和发展初期,这种体制发挥了很大的作用,带来的成功也是有目共睹的。但是,副作用也很明显。比如,显著特征之一,就是“三高—

低”,即高收入、高消耗、高污染、低产出,这是难以持续的。并且,随着经济社会的深入发展和国民需求的提高,其弊端日益凸显,沉淀为下一步发展的障碍和潜在的危机。

转变增长模式的出路在于体制改革,如果不改革现行体制,贫富悬殊问题、分配不公问题、土地问题、环境问题、腐败问题、社会冲突等问题,不仅很难合理有效解决,可能还会演化为社会危机。

以被称作“共和国长子”的国企为例,三个突出问题,一是“租费利”不清,比如该缴纳的资源租金和上缴的利润以及被“摊派”的社会费用不规范,缺少一个明白账;二是企业分类不明,因为营利性国企和公益性国企的职能不一样,不能一刀切进行管理;三是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没有理顺,这三个层面的问题解决不了,国企改革必然会陷入困境并将制约自身的长期发展。

党国英 处理好四个方面的关系

【放权,民主问题主要涉及这个问题。政府管的事情,和交给社会管的事情,要分开。】

要说改革困境,先要讲改革的难题。当前,最大的难题是处理四个关系。

第一个,劳资关系。这太需要改变了。工资上不去,怎么提高消费的比例?新劳动合同法没有得到落实,工会起的作用远远不够。这些非常重要,但又都没有做好。劳资关系不调

整,问题很大。

第二个,中央和地方的关系,也包括各级政府之间的关系。至今,理论界一直没把这个问题作为重要问题提出来。如果这个关系法治化,整个经济运行的风险就会降低。地方做什么,中央做什么,定好。比如房产税,或者说财产税,一定是地方税,中央放手,收与不收,完全由地方决定。

第三个,国家和社会的关系,实际上就是该国家管的国家管,该社会办的社会

办。政府管的事情,和交给社会管的事情,要分开。

第四个,要处理好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关系。土地的使用,有私人的层面,也有公共性层面。公共性问题靠规划和用途管制来解决,不涉及狭义的产权;私人层面的事情就不要干涉。集权不要干涉,民主也不要干涉。

这四点,是四根难啃的骨头,也是四个方面的困境。这是改革长期的任务,脑子一定要十分清楚,并作为长期的战略来抓。

周超 寻求效率与公平的平衡

【以解放思想和改革开放为精神资源,依靠社会建设和政府改革双轮驱动,在制度创新中不断回应来自表层和深层的双重挑战。】

说改革困境,就要说改革的挑战。

以广东为例,一重挑战来自表层,具体表现为经济增长方式如何从“外源型经济”向“内源型经济”的转

型,如何在做大蛋糕(效率)与分好蛋糕(公平)间求平衡,尤其是在如何在继续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,逐步消除城乡差别、区域差别和贫富差别;社会秩序的维护,如何从生硬粗放的社会控制,向服务取向的社会管理转变,如何有效地控制腐败。

另一重挑战则是来自深层次的挑战,这种挑战根源于体制性的内在难题——一体化

体系的垄断逻辑与市场竞争之间的紧张性和排斥性,这是根本性的结构性挑战。

广东在深层上面临的最大挑战在于,如何建立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的法治民主和公平正义的制度框架,如何在市场、社会与政府逐步分离的状态下形成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格局,真正建立起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治理模式。

